

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

张光明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D0-0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6)05-0090-02

不久前,高放教授送给我一本由他和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此书初版于1990年,作为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教材,当时就受到教育界以及其他各个领域众多人士的欢迎。此后一版再版,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影响。第三版在2003年出版,我曾经写过一篇书评,发表在该年度第11期的《教学与研究》上。没想到时间刚刚过去两年多,第四版现在又问世了。前后两版相隔时间如此之短,可以推想此书畅销的程度。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个问题早已变得不那么受人关注,甚至在不少人心目中已被视为无意义的陈词老调的时候,谈论这个问题的书还能遇到如此欢迎,确实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和祝贺的事情。

收到新版后,和上一版对照了一下,感觉是,虽然总的结构、观点和叙述没有大的改动,但还是有不少局部变化、补充和更改。此书以前各版材料丰富,内容扎实,涉及范围广泛,原是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对此,我在第三版的书评中也已经指出过。这个第四版在保持这些优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使之发扬光大了。这既表现在对材料的取舍和对许多具体史实的叙述上,也表现在对一些主要观点阐述的改进上。

首先,新版的信息量更大了,使用的材料更为丰富了。民谚有“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之说。熟悉本专业的“内行”细读此书,从中大约不难发现一些常人容易忽略的事实。有心人由此开拓思路,按图索骥,进一步去寻找相关材料,相信可以找到新的研究起点。特别是书中对当代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的评析,对当今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介绍和评价,述之甚详,观点也十分公允,颇值得一读。例如,对冷战结束以来托派的分析,对“左派”共产党的分化、僵化与进化”的分

析,对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各派的“新态势”的分析等等,都是第三版和本版中很好的部分,其中既吸取了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学术成果,又结合了编写者们自己的研究所得,写得相当细致,并且提出了许多独到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我愿在此再次(第三版的书评中已提及)指出本书对托派的评价。众所周知,“托派”这个名词,在过去长时期中在我国完全等同于反革命,除了对它一味诅咒谩骂之外,不允许再有任何别的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虽有变化,但研究者们大都还是尽量绕开,少有人愿意去碰这个费力不讨好、说不定还可能惹麻烦的领域。而这本书不但不回避麻烦,而且在较详细地介绍和批判地分析了托派当代的理论主张和组织活动后,最后作出这样的评价:托派组织“七十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这个结论观点鲜明,毫不含糊;在我看来,它也是完全客观正确的。

其次,在一些地方,本书新版做了值得注意的补充更新,关于这些,读者大可自己去对照比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本版序言中已经提到了的,这就是“导论”中的一处主张。这个主张认为:对“共产主义”这个术语,实际上译为“公共主义”更为准确。初看起来,这个提法近乎无谓,“共产主义”一词久已成定译,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现在为什么又要标新立异呢?然而读下去便可以发现,这个标新立异并非没有意义。本书提出了一个掌故:八十多年前已有人将communism这个外来词译为“公共主义”。从原意看,communism这个词,本来确实具有由整个社会共同管理自己的事务、共同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含义,“公共主义”的译法就包含了这层意思;而“共产主义”的译法则似乎主要只强调了把财产归于公有的意思。这样看来,“公共主义”的译法自有其优越于“共产主义”之处。当然,我在这里所转述的只是本书作者们自

己的看法,别的学者未必都会接受;此外,对于“共产主义”这类早已为公众所熟悉和接受的术语,即使有缺陷,现在恐怕谁都无法再作改动了,本书作者们对此也是很清楚的。但不论如何,提出这一主张的确包含着对事物作更深入、更全面理解的启发性思路,具有积极的意义。

再次,仔细对照一下可以发现,本版与以前相比,在观点上也有一些改动和变化,它们反映出作者们注视时代发展,跟踪最新事态,不断总结经验并吸取近年来新的学术成果的事实。仅举一例: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历来争议极大的问题。按照当年斯大林的说法,是列宁首先提出了这个“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即在一国取得政权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而这个理论被赞誉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然而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演变源流的人都知道,对此说历来争议极大。特别是在苏联和中国以外,持反对意见的大有人在,认同斯大林看法的反而不多。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改变,国内学者也已经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斯大林假借列宁名义自己的创造。在这种情况下,本书新版在大体仍持原来看法的基础上,缓和并修改了先前的说法,不再讲斯大林“坚持”列宁的主张,而是改为斯大林“另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见第四版第112页)。从作者的立场出发,我以为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反映出作者对新的学术进展既吸取又谨慎的态度。

我希望从上面所举出的这几个例子,已能使读者看出这一新版所作的改进。当然,依我之见,本版还是有一些缺陷,其中有的是原来版本中遗留下来的。除了我个人持不同看法的地方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些说法欠准确和欠妥当的地方。在新版第85页上说:“马克思发现,东方社会……由于灌溉和兴修水利的需要,那里普遍存在着土地公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这就是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但据我理解,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这样的:土地公有制度是从原始公有制那里继承来的,而并非由于“灌溉和兴修水利的需要”。这一需要并不是造就了这些土地公有的公社,而是在它们之上竖立起了无所不能的集权政治,即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可见,上述说法是不够准确的。另外,下面紧接着说“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就使得东方社

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原先所归纳的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也未必合适。因为据我所知,马克思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认为,直到近代以前东方始终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发展道路,他并没有把东方的发展看作是“一般规律”的例外,因而,“偏离”的说法似乎也不太恰当。

近年来,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和新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作宏观理论反思的著作增多了,出现了一些饶有新意、值得认真研读的书籍和文章,例如,韦定广的《“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人类解放主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边鹏飞等人的《反思与求索——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者曾以拥有完整而有说服力的理论而自豪。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的实际发展显示比理论预测更加复杂,从而向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挑战: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按预期的那样在西方发生,东方却意外地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由此所决定,社会主义并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之后的替代形态,而是演变为发达工业化社会中的改良力量和落后地区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对历史发挥自己的影响。由于理论体系遇到了这些棘手问题而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现代和当代,到处都愈益放弃或“淡化”其科学说明世界的企图,重新退回到了伦理主义的领域。这些现象都是现实的、可以理解的,然而真正的理论探索却不能满足于现象,不能满足于对既有的存在做支离破碎的、实用的解释和辩护,而应当深入于现象内部,本着科学的和批判的精神认真考察分析本质之所在。当着这样做时,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新回顾并总结历史,包括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历史。换句话说,运用马克思学说所创造的、至今仍然有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去检验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以来的全部社会主义演进史,仍应当是当今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不如此,社会主义便失去其理论说服力,沦为令人生厌的“官房学”。因此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的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更多更好的著作出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往各版迄今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使我们有理由期待它在未来的新版起到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刘蔚然]